

迈力克默号事件 与冷战初期联邦德国 对新中国的贸易政策 (1949—1952)*

陈 骏

摘 要：1951年4月发生的迈力克默号事件是冷战初期联邦德国(西德)对华贸易的一个关键事件,体现了这一时期从西欧到中国大陆复杂的贸易网络的发展情况。该事件不仅使西德企业的对华业务遭到极大打压,也几乎中断了方兴未艾的西德东亚航线。在西德贸易主权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美国的强大压力和西德政府自身的战略考量是西德对华实施严厉贸易禁运措施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西德政府也为日后发展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保留了一扇门户。

关键词：迈力克默号；西德；新中国；贸易禁运；东亚航线

作者简介：同济大学 德国问题研究所 副研究员 上海 200092

中图分类号：D822.351.6；K5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22)02-0102-19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冷战时期联邦德国对华经济外交研究(1949—1990)”(项目编号:17CSS030)的阶段性成果。

作为联邦德国(西德)建国后第一艘驶往远东的货轮,隶属于西德著名航运巨头瑞克麦斯公司(Rickmers)的迈力克默号轮船(Mai Rickmers)^①于1951年3月3日离开德国汉堡港,在香港停留三天后于4月21日离港驶往上海,并计划随后前往天津和大连。^②但轮船在驶往上海的过程中被国民党政府海军截获。随后,这艘插有西德国旗的9000吨货轮在巡洋舰的押送下驶往了基隆港停靠。^③西德政府很快对迈力克默号所属的瑞克麦斯公司进行了惩罚,并中断了西德对中国大陆的海上航线,同时拒绝再颁发新的对华贸易^④许可证。由此西德对华贸易额大幅下滑。西德看似完全进入了美国领导的西方对华贸易禁运的轨道,而中国对西德的贸易也似乎遭受了重创。

传统的有关冷战初期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贸易封锁禁运的研究,偏重美国及其盟国的外交战略、谈判协商和禁运政策演变等问题,^⑤较缺乏对具体禁运和反禁运案例的研究,对这一时期从事对华贸易的西方企业的考察尤为稀少。同时,国内学界有关美国的西欧盟友在对华禁运过程中政策和角色的研究主要针对英法两国,欠缺对西欧经济第一大国西德的研究。^⑥

在国际学界对1950年代初期西德对外和对华贸易的研究中,学者们普遍强调西德建国初期同盟国,尤其是美国对西德外贸和对华贸易的绝对影响。西德被视为是最严格执行了美国主导的东西方贸易禁运的国家,它与社会主义阵营进行经济交流的空间非常有限。这一观点与1950年代西德企业界的观点十分类

^① Mai Rickmers 号被台湾当局俘获后,台方的档案中将其音译为“迈力克默号”,本文沿用了这个译名。台方档案参见中研院外交档案,档号:11-06-33-09-02-003。本文所使用的台湾当局档案的获取得到了辅仁大学萧道中教授和政大历史系张扬舞的帮助,特此表示感谢。

^② 由于此时上海仍被国民党当局封锁,天津和大连等中国北方港口成为了中国大陆货物进出口的主要港口。解放较早的天津当时是贸易量和关税总额最多的城市,大量新中国新成立的国营公司在此承接了大量战争物资。这也是迈力克默号前往中国北方港口而非上海的重要原因。参见董志凯:《跻身国际市场的艰辛起步》,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4页;Kenneth Lieberthal, *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 1949-195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97-99.

^③ 《德轮在赴沪途中被国舰截获,已解往台湾基隆港》,载《香港工商日报》,1951年4月27日;《我海军截获西德货轮一艘》,载《台湾新生报》,1951年4月27日。

^④ 本文中的“对华贸易”,指的是西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关系。

^⑤ Frank Cain, *Economic Statecraft during the Cold War: European Responses to the US Trade Embargo*,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1-39; Michael Mastanduno, *Economic Containment: CoCom and the Politics of East-West Trad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64-106; 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刘子奎、朱杰:《美国学界关于冷战时期出口控制政策的研究》,载《世界历史》,2019年第5期,第27-44页。

^⑥ 参见吴浩、刘艳斐:《1954年日内瓦会议与英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6期,第112-127页;高嘉懿:《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中法围绕商务代表问题的外交互动探析》,载《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8期,第39-51页;聂励:《新中国成立初期香港贸易危机与中英关系》,载《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2期,第98-112页;吴浩、刘艳斐:《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与英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1952—1957)》,载《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1期,第81-95页。

似。^①而近期出版的对西德财团和企业等非政府行为体在对华贸易中角色和作用方面的研究,和传统研究一样也忽视了1950年代初期西德政府及企业在对华贸易上与美国和其他盟国的复杂互动。^②同时,上述有关西德对华经贸政策的研究都缺少相关的中方材料,叙述逻辑和线索单一,难以解释中德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本文将利用以德国政府档案^③为主的多边政府档案材料,结合瑞克麦斯公司的档案材料,对1949年后西德对华贸易的发展和影响因素,以及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迈力克默号事件的经过,和西德政府对此的应对及其影响进行探讨。^④同时,冷战初期西德与新中国之间的贸易航线也是一个在传统研究中被忽视的问题,该条航线在东西方贸易禁运之际维持了新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同时也导致了迈力克默号事件的发生。鉴于此,本文也将对贸易航线问题进行探讨。

一、建国初期西德对华贸易及其重要影响因素

二战爆发前,中德贸易关系在双方的对外贸易中都占据了重要位置。1936年,中国是德国在欧洲之外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德国则是中国的第三大进口国,占中国进口额的15.9%。中国主要进口德国的工业品和机械设备,其中尤以军火最具代表性,占德国军火总出口的28.8%。这远高于其他国家在德国军火出口中的占比。^⑤二战爆发和中德宣战(1941年)后,双方的经贸往来也并未因政治和军事的敌对而大幅下滑,中国对德进口在1945年前仍长期居国统区对外贸易第一位。^⑥

^① 参见 Dok. 4: Bericht des OAV, in Mechthild Leutner (Hrsg.),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China, 1949 bis 1995, Politik-Wirtschaft-Wissenschaft-Kultur, Eine Quellensammlung*,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5, S. 51-53; Sven Jüngerkes, *Diplomaten der Wirtschaft: Die Geschichte des Ost-Ausschusses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Osnabrück: Fibre Verlag, 2012, S. 141-143; Karl-Heinz Schlarp, „Das Dilemma des Westdeutschen Osthandels und die Entstehung des Ost-Ausschusses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1950—1952“,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Jahrgang 41, 1993, Heft, 4, S. 221-276.

^② Giovanni Bernardini, „Principled Pragmatism: The Eastern Committee of German Economy and West German-Chinese Relations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1949—1958“,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51, No. 1, 2017, pp. 78-106.

^③ 主要包括联邦德国经济部和外交部的档案材料。

^④ 台湾学者陈椰在利用弗莱堡联邦军事档案馆所藏法肯豪森将军的对外通信的基础上,在汉语学界第一次对迈力克默号事件进行梳理。但法肯豪森将军并非战后西德军政的决策和参与人物,且冷战初期西德对社会主义阵营禁运的材料绝大部分保存在外交部和经济部的档案中。在没有参阅上述档案的情况下,陈文错误地认为台湾当局对迈力克默号事件的处理态度成为了西德政府与台湾关系发展的消极因素。参见陈椰:《战后德国与中华民国外交关系的演变 1945—1955》,载《档案季刊》,第10卷第1期,2011年,第4-15页。

^⑤ 在中国沦陷地区,德国对华出口尽管大幅落后于日本而居于第二位,但在1942—1944年间均有所增长,参见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史实的综合分析》,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第186页;William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90, 221.

^⑥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190-191页。